

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

靳会新

【内容提要】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地理因素、自然因素外,在其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几个关键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对其文明特征、民族性格的影响巨大。本文主要从留里克王朝的建立与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引进,“罗斯受洗”与拜占庭文化的引进,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彼得大帝改革引进西方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十月革命的胜利等方面,分析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

【关键词】 俄罗斯 民族性格 外来文化

【作者简介】 靳会新,1963年生,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编辑。
(哈尔滨 150080)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地理因素、自然因素外,在其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几个关键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对其文明特征、民族性格的影响巨大。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民族性格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而俄罗斯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除了遵循自己内部规律、保持自己的本色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吸纳、借鉴、涵化和融合,对其文明特征、民族性格形成的意义不可低估。人类有史以来,不同文化便开始了跨越民族、种族和国家进行交流,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古罗斯处于东西方交汇的多种先进文化——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包围中,其民族性格中的冒险进取精神,坚韧不拔、勇于牺牲和勇于追求自由的品格以及“弥赛亚意识”、扩张性、依赖集体、崇拜权威、好走极端、两面性等特征,都与其历史上外来文化的进入关系密切。

一 留里克王朝的建立与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影响

关于古罗斯国家的起源有不同的学说,其中有代表性的为诺曼建国说,认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兰人帮助古罗斯人建立了国家(留里克王朝)。

诺曼人即古代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最早出现的文字记载是在受其侵袭的西北欧修道院文献中,他们被称为“维京人”。人们认为“维京人”是“海上流浪汉、入侵者、征服者,狡诈、勇敢和残忍的人”¹。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诺曼人以捕鱼和抢劫为生,他们有出色的航海技术,掌握着武器制造工艺。凭借着这两点及其强烈的冒险精神,从8世纪开始了对外征服活动。

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分为三支: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他们分别向西、向东扩张。其中的瑞典

¹ 王皖、沙扬编译:《古代北欧海上探险者》,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转引自王惠宇《简论诺曼人在欧洲的扩张》,载《佳木斯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息,是一个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载体,是文化发展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古罗斯文字的创始人为基里尔兄弟,出于传教的需要,兄弟俩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新的字母,用来记录和表达斯拉夫人的语言。罗斯接受基督教后,基督徒做礼拜要念诵经书,基里尔兄弟将用他们创造的文字所翻译和编撰的祈祷文献和宗教著作引入罗斯。从此,基里尔字母在罗斯逐渐被普遍采用。古罗斯文化的发展直接受惠于基里尔字母的创造和译作的引进。同时传入罗斯的还有标点符号、制造书写材料如兽皮纸、墨水、颜料的技术以及书籍装订的技术。文字的诞生对罗斯民族语言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罗斯积累文化知识、文字和书面文化的快速发展和传播创造了条件,并且为加强东斯拉夫各部落的联系,进而将各部落统一为国家打下了基础。

古罗斯的文学形式也发端于拜占庭。编年史、演说词、使徒行传等文学体裁随同东正教一起传到罗斯。罗斯最早的编年史《往年纪事》就是模仿拜占庭的年代纪事史书。为了满足传教布道的需要,教会文学活跃,为罗斯人提供精神和道德食粮,客观上促进了罗斯文学的发育。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有伊拉利昂的《法与神赐说》、伊阿科姆的《弗拉基米尔颂》。

东正教的传播需要大量的神职人员,为了培养完成圣礼和教育教徒的神甫,罗斯开办了大量的学校,培养了罗斯第一批知识人士。这些学校是谓俄罗斯早期教育的雏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的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东正教被定为国教后,作为信仰与精神化身的教堂便从古罗斯各地兴建起来。教堂的建筑风格及装饰自然追随拜占庭教堂的模式,拜占庭教堂的模式起初几乎被原封不动地搬进古罗斯。教堂集建筑、雕刻、绘画艺术三位一体,所以教堂的建筑艺术成为了罗斯建筑、绘画和雕刻艺术发展的直接促进因素。作为教堂内装饰的重要组成的壁画、圣像画成为俄罗斯绘画艺术辉煌乐章的第一个音符,启发了罗斯人的精神生活。

在古罗斯,第一个圣像画艺术流派形成于公元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期,起因是建造、装饰“十亩”教堂,在这里工作的有希腊建筑师和其他工匠,对流派形成起了很大影响作用。第二个古

罗斯绘画流派形成于1030~1040年间,主要原因是建造和装饰圣索菲亚教堂,需要更多的画家合作来完成这些繁杂的壁画、马赛克镶嵌画、圣像画等多种画种的绘制和制作。马赛克镶嵌画、壁画、圣像画在古罗斯基辅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里希腊艺术家带着古罗斯学生一起工作,形成了古罗斯基辅绘画流派,从技术和直观上熏陶着一代代俄罗斯艺术家,培养了一代代的艺术家。可以说,东正教教堂艺术的深刻影响贯穿了古罗斯的艺术发展史¹。

(二) 拜占庭文化和东正教的传入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影响

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专制思想和制度的确立。如前文所述,拜占庭处于东西方交融之处,而且其文化思想基础来源于基督教的、罗马的和古希腊的文化。尤其是早期拜占庭文化形成时期,其统治者竭力弥合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的矛盾,在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之间进行取舍,为了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排斥所做的努力最终成为拜占庭文化的特色并固定下来。“用来建立在某种整体的框架内把意识、文化和思想现实保持住的连接物。这种文明的连接物中最重要的是专制君主的神圣权力,非法制的君主专制国家的思想,表现在不同的官僚制度中的严格的权力等级的思想等。”²

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解释,艺术是一个民族为解释、表现和享受生活而对他们自己想象力的创造性运用”。古罗斯早期和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建筑、绘画、文学创作,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受拜占庭文化的巨大影响,直到现在,俄罗斯现代艺术创作中还保存着拜占庭文化的印记。文化本身就包含着对生活的解释和理解。古罗斯接受了拜占庭文化,也同样接受了这种文化对生活形成的一些观念。并且,艺术本身又具有快速有效传播思想、观念的作用。早期的俄罗斯绘画多以宗教内容为题材,民众就是通过这些绘画,直观地了解、理解东正教教义的。教民们置身于直指

¹ 参见王鹏《东正教教堂与古俄罗斯主要绘画流派》,载《齐鲁艺苑》2007年第5期。

² 朱达秋、周立:《俄罗斯文化论》,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³ 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21页。

苍穹的教堂里,环绕在宗教题材的壁画和圣像画前,交流并分享着感情和生活体验,接受着教会对国家、大公(沙皇)权力的定义,“君权神授”、“第三罗马”等理论在潜移默化中深入到人们的头脑之中,融入进了民族的血液之中,忠君、顺从、忍耐、怜悯以及“弥赛亚意识”带来的上帝选民意识、扩张性等民族性格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形成,成为民族的整体无意识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最终形成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宗教因素,即基督教的选民意识、对上帝的绝对服从意识、末日拯救意识、绝对精神自由意识等对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深层影响却是最为根本的。作为一种信仰,东正教已融入到俄罗斯人的血液中,以东正教信仰为核心的文化模式成为左右俄罗斯民族行为的基本准则,民族的思维方式、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习俗、精神气质、心理和性格等许多方面都可以在东正教中找到根源。尤其是“第三罗马”理论连同东正教中的“弥赛亚主义”、基督“感化天下、普济众生”、建立“千年王国”等教义一起深深渗入到俄罗斯人的思想中,共同铸就了其民族强烈的“救世”历史使命感。

东正教的聚合性与俄罗斯古老的村社集体生产方式的结合,使服从于集体、国家、政权及其代表者的集体性、集体主义精神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主要特征;基督教教义中的戒律与村社生产、生活原则的吻合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的道德标准;东正教上帝之爱的怜悯情感和村社中的同情心共同造就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同情弱者的善良一面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俄罗斯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生活在村社中的农民们被教导向往着上帝的爱,一般人的理想即为,生活在沙皇的“父亲般的关怀”下,爱和尊敬一切人,包括亲近的人和疏远的人及自己的仇敌,宽恕有罪的人和有过失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流了鲜血,每一个人都有着上帝的形象¹。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在村社中互相帮助,还热情地接待借宿的陌生人,包括乞丐,总是同情弱者和受苦的人。

俄国历代统治者都利用东正教强化政权,巩固沙皇制度。在东正教的培育下,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皇帝不仅是世俗的最高统治者,而且是圣者,是上帝的代理人,是人民的保护者。“弥赛亚意识”和“第三罗马”理论不仅强调了俄罗斯

国家权威,而且再一次强调了君主的力量和权威。普通民众坚信只有把上帝、君主和人民的力量融为一体,才能完成拯救世界的使命。他们不仅接受专制,而且崇拜君主。人们一直期盼着救世主的出现,期盼着在全知全能全善领路人的带领下到达幸福的彼岸。这种观念遇到合适的情况,就会为强有力的个人集权作出思想准备。

总之,拜占庭文化的引进,使罗斯在农业、手工业、语言文字、教育、科学、建筑、绘画等方面得到飞跃发展,加速了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尤其是俄罗斯文化由此获得了质的飞跃。最为重要的是,罗斯接受基督教,使其文化被纳入了欧洲文化范围,罗斯也接近了欧洲国家。可以说,接受东正教引进拜占庭文化对罗斯未来文化发展的走向与特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它的民族性格。尤其是东正教对俄罗斯国家政治制度、民族性格的影响巨大。

三 金帐汗国的建立与蒙古鞑靼文化的影响

1240年11月19日,基辅沦陷,俄罗斯进入了蒙古统治时期。1243年,拔都定都萨莱,建立金帐汗国。蒙古汗国是一个典型的亚洲“封建军事牧奴制”专制国家,大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集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于一身。

金帐汗国对古罗斯实施了严酷的政治、经济、军事统治,严重地影响了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里要特别说明金帐汗国对东正教的态度。蒙古人在征服罗斯的军事战役中,对待东正教人士和财产毫不留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政权稳固后,对东正教实行了怀柔政策。蒙古人统治时期是教会影响扩大的重要时期,修道院的数量在鞑靼蒙古人统治俄罗斯的240年间比此前罗斯受洗到金帐汗国建立的250年修建的增加了2倍多²。从13世纪50年代开始,教会得到免税特权。1267年,蒙古可汗向教会颁布特许状,教会由此获得了更多特权。“僧侣免纳贡赋,教会的各种不动产宣布一律不得侵犯。而且在宣布以前如

¹ 参见黎海波、宋瑞芝《论东正教与俄罗斯村社文化的亲和性》,载《西伯利亚研究》2005年第4期。

² 朱达秋、周立:《俄罗斯文化论》,第127页。

四 彼得大帝改革与西方文化的影响

彼得大帝的改革对俄罗斯历史影响巨大,俄国由此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农奴制下的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很落后。农业生产工具原始,在残酷农奴制的剥削下,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农作物产量极低。工业还没有建立完整的手工业体系,全国仅有手工工场20余家。商品匮乏,交易量也很小。文化教育水平落后,全国仅有两所教会学校,居民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军队的战斗力落后于同时代欧洲强国,装备落后,兵员素质都较低。

蒙古鞑靼人对罗斯200余年的统治,使处于欧洲东部的俄罗斯囿于东方文化的传统之中。伊凡三世打败金帐汗国统一国家后,开始恢复了与欧洲的联系。从伊凡三世、伊凡雷帝,到鲍里斯·戈都诺夫,再到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者们都对国家进行了一些改革,渐渐加强了与西欧文明的联系,俄罗斯的文化社会生活开始发生一些积极变化,为彼得大帝的改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农奴制下的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很落后。以彼得一世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清醒地认识到俄国的落后状况,决心仿效西方先进的经济、文化制度,实施自上而下的重大变革,试图抛弃传统制度和生活方式,接受先进的西方文化。彼得大帝主要进行了社会文化改革、国家机构的改革、经济改革、用人制度的改革、军事改革、宗教改革、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的改革。

除了以上各领域的改革,将首都由莫斯科迁往圣彼得堡也是彼得大帝全面改革的组成部分,可称得上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迁都一方面可以摆脱旧的封闭势力对改革的阻挠;另一方面,濒临波罗的海的新都又为其战略扩张、加速欧化创造了条件。彼得大帝的改革和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对俄罗斯民族文化和性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彼得大帝对西方文化的引进最为引人注目,其影响也更为深远。他打开了因袭封闭的俄国通向西欧的门户,让俄国人呼吸到了西方文化的气息。他首先从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入手,以社会风气的变化带动全面改革,打破了俄罗斯人闭塞守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他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清除俄罗斯人的愚昧,移植西方文学艺术。科学的意义得到承认,确立了地位,从此科学成为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方向。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为俄罗斯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成分和活跃的因素,改变人们顽固不化的心理,为俄国现代化的启动创立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因为传统文化在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时便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惰力,人们的思想要想从已成定势的旧体制中挣脱出来,既需要来自主体内部的自省自识,更需要来自外界客观的冲击和震荡,西方先进文化在俄国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起到的正是这一作用¹。西方文化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生活方式、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渗透力特别大,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对后来的俄国知识分子来说意义尤其重大,他们开始了对国家、政治、社会问题的思考,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俄国的专制制度,开始了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从十二月党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及实践,到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新一代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把该理论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都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与传播。

(二) 彼得大帝的改革对俄国历史、社会、民族性格产生了巨大影响。是选择走西欧社会发展道路,还是固守斯拉夫传统,增加了民族性格中的摇摆性;强制性的改革也进一步加大了民族性格中的极端性;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二重性矛盾也在彼得大帝的改革后表现得更加强烈。

第一,这是由于其强制性的改革给俄罗斯文化提供了更多有悖于传统文化的选择素材。

第二,强制性改革在短时间内进行依靠的是沙皇的绝对意志和非常手段以及民众对当权者的信任与服从,改革强化了民众对权威的服从与崇拜。人们对改革的接受缺乏时间来消化、吸收和领会,这时积淀在人民思想意识中的宗教崇拜和权威崇拜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上层社会对改革

¹ 参见张建华《西方文化之于俄国:动力?抑或阻碍?》,载《俄罗斯文艺》2005年第1期。

带来的新事物怀着神圣的宗教般的感情予以承认。“正是彼得大帝时代形成了后来俄罗斯文化特有的将‘俄罗斯灵魂’的宗教热情转向非宗教目的的能力,也就是把俄罗斯灵魂的宗教热情转向社会的科学的文艺的和政治的目的。”¹所以,一方面彼得改革将国家文化世俗化了,另一方面,又将世俗神圣化了。宗教般的狂热使一些人迷失了理性,激进主义、极端行为的内容表现得更加丰富:既有对历史、伟大人物的推崇备至,也有对各种思想流派主义的顶礼膜拜,更有平民知识分子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跟从,对革命的狂热等等。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在俄罗斯历史文化、未来发展道路问题争论中流露出来的对于己方原则立场的绝对忠诚,双方的刚性对立,不能容忍异己思想,就很可能说明问题。抛开双方争论的具体内容,仅以他们争论的态度和方式而言,争论是在极端和“相互激愤”之中进行的,有时争论本身似乎成了争论的目的。

第三,改革加深了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的隔阂。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文化及其相应的社会心理,下层普通民众仍生活在古老的传统和文化中。不仅上下层国民的价值标准、取向、理想的距离越拉越大,就是上层知识分子之间关于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孰优孰劣的意见也针锋相对。

第四,彼得大帝改革结出文化二重性的另一个果实就是形成了重视国家与强调个性的矛盾冲突。西方文化倡导的个性解放、个人价值的实现被一部分知识分子接纳下来,但彼得改革又是围绕打造一个强大的帝国展开的,实际上改革加强了国家和集体的观念,集体与个人的冲突在所难免。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野蛮”,“在彼得的统治下,国家利益扩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每一个人自己的活动都被局限于国家利益的范围之内,每一个人没有自由,这就是彼得改革的代价。”²

最后,由于他的改革目的和改革成果主要服务、服从于对外战争的需要,由此又增强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扩张性成分。

五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19世纪40~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开始传入俄国,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最早是由俄国的民粹派译介到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为俄国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做好了迎接工人运动的准备。

19世纪80年代,俄国出现工人运动的新高潮,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们从中看到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在俄国相继成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1888年,弗·伊·列宁参加了喀山马克思主义小组。1889年,列宁迁居萨马拉,从1892年起,列宁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在萨马拉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并与其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联系,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密切了同工人运动的联系,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1895年,列宁在俄国工人运动的发祥地彼得堡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谓未来政党的雏形。在列宁和其主办的《火星报》的努力下,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出席了大会。大会展开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革命路线。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时,分化出拥护列宁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拥护马尔托夫的少数派—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俄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俄国革命的领导力量,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有人说,19世纪的俄国就像一位思考者。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社会现代性问题和文化复兴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和艰难的探索。他们不仅从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中探源,还从西方哲学家、思想家那里寻求答案,到西方文化中寻找改造俄国社会的理论。他们中的一些人更多地接

¹ 朱达秋、周立:《俄罗斯文化论》,第169页。

²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在其学说中找到了解决俄国革命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理论在俄国得到广泛传播,并经过俄国本土化改造和运用。苏联的建立不仅改变了俄国的历史进程,最终还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苏联建立后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制度方面的探索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影响是巨大的。

(一) 经济制度的影响

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有两种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俄罗斯社会原本缺乏私有观念和具有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强化。制度是用来规范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原则的,集体、国家所有制是俄罗斯民族在其谋生方式中起主要作用的核心因素,集体所有制模子锻造出的民族个性只能拥有集体主义特质。

苏联经济实行的是典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主要表现为集中确定社会需求,集中计划和决策,集中和高度行政化管理。不仅宏观经济比例由国家严格规定,而且部门的、地区的,所有的社会生产比例也都由国家确定,具有高度计划性;高度集中管理,由政府集中配置资源,集中制定硬性价格,集中管理人、财、物、产、供、销等一切经济活动;国民经济计划通过行政指令性方式实现,由国家政权、行政机制的强制力推动经济运转。

在国家建设初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促进了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奇迹,激发了俄罗斯人对国家的自豪感,深化了人们不计私利和自我牺牲精神。但这种排斥市场经济的产品经济观也逐渐暴露出致命的缺点。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来发展国民经济的现代经济体系。一方面市场经济直接参与了社会、民族性格中理性和妥协精神的建立。因为市场经济就起源于理性的交换。人时刻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以满足最大限度的需要,但资源的有限性与无限需要的满足处于矛盾之中,迫使人们必须学会理性的算计,力争以最小的机会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并且只能是在理性人之间进行这种交换。为了保证交换的持续进行,交换必须在相互妥协、合作中实现互利互惠¹。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建立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只有依靠市场经济体制的强大支

撑,公民社会才能对抗强大的国家得以确立。在公民社会中,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冲突可以在合法的框架下得到统一和化解,这一过程,也需要各方具有理性和妥协精神才能实现。所以,这一过程也是理性、妥协精神养成的过程。

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运行体制,堵住了其通往公民社会之路,在强大无比的国家面前,社会中人的个性受压抑、遭抹杀,个人无法公开地、直接地、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追求个人利益,成为具有自由平等意识的、有个性的独立个体。民众无缘市场经济,也就无缘公民社会,无缘理性、妥协的民族精神。也就是说,如果缺少市场经济这一课,理性和妥协是无从谈起的。排斥市场的、高度集中的苏联经济体制,只能强化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极端和激进的特征。

(二) 政治制度的影响

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其特点非常鲜明地体现在“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和高度集权的国家管理机构中。国家的组织形式是苏维埃制度,执政模式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党政不分,党内高度集权,实行的是形式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中央集权制。

权力来源同一,作为国家组织形式的苏维埃制度的核心规范是“议行合一”原则。由于政治体制中整个权力部门的不发达,权力的垄断权实质上落到了不经任何人选举的、不服从任何人监督的执行权力机关的手中²。由于没有任何合法的力量可以制衡执行权力机关,最后权力异化于人民。在高度集权和严格控制之下,人民只有拥护和服从领导和统治,不仅失去表达个人意愿的权力,也失去了对国家和集体的发言权,不仅失去了发言权,而且失去了思考权。失去多样性的社会有机体失去活力,停止进化,民族性格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被固化在了帝俄时期的那些带有宗法制传统文化烙印的特征上了,而且这些特征还被进一步强化,因为国家和最高统治者还刻意塑造了维护其高度集权政治制度所需的民族性格,进一步巩固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集权主义、集体主义

¹ 参见赵可金《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5页。

² 参见〔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倾向,强化了个人对集体的依附,并延伸成为民族成员对共同体人格化的依附。人民习惯依赖国家,愿意相信权威,缺乏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能力,如此,也自然容易走极端和做出偏激的举动。

(三) 文化制度的影响

苏联时期的文化方针政策是在政治上配合消灭私有制、阶级和阶级剥削,统一社会思想,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舆论一律”,稳固社会政治和道义一致的根基,引导、组织全国人民建立超高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为特征的、“消灭富农”阶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遵循上述方针确立的文化工作运行体制主要为:通过设立统一的专门机构、任命这些机构的领导人、制定统一的政策、控制舆论宣传工具等,对文化建设实行集中领导;利用行政手段对文化领域进行统一规范,保持思想文化建设的具体活动在可控范围内的整齐划一;对文化实行计划性、简单化管理。

苏联时期的文化政策和制度是为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的,采取的手段也是高压控制,文化成为一种绝对化了的政治斗争文化,失去了自身应有的特色。领导人不是根据文化自身的规律进行文化建设,而是依僵化的理论、教条、个人意志,运用破坏性的手段“大批判”、“大清洗”,甚至是肉体消灭来树立对领袖的顶礼膜拜,采取高压的文化政策、高度集中的文化领导体制确立斯大林对所谓“真理”的垄断,将其塑造成一个具有特殊才能,能明辨是非、善恶的天才,是带领人民通向幸福彼岸的引路人,人民只需放弃决定、思考的权利,做一个忠臣、顺民就能获得幸福。剥夺了人们自由思考的权利,压抑了自由创造的渴望,扼杀个体独立,强化专制、极权。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对文化制度作了一些改革,但根本性质没有变。由于国家文化制度过分强调同质性,将共同的信仰和观念作为社会整合的唯一手段,非此即彼的刚性意识形态,为极端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性格中集体主义的存在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四) 法律制度的影响

苏联制定了一系列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法

律,并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但立法中,有许多违反法治精神实质的内容,法律与国家、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本末倒置,将法律视为工具,整个国家的法治观念极度弱化。法治和法制观念十分淡薄,导致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法治国家所倡导的精神一直无法在俄罗斯建立起来。相对于强大的国家,个体显得如此渺小,只能仰国家的鼻息生存。

综上所述,以文化范式划分俄罗斯历史,似可分为六个时期:基辅罗斯、鞑靼罗斯、莫斯科罗斯、圣彼得堡俄罗斯、苏联、后苏联俄罗斯。伴随俄罗斯重大历史事件的是外来文化的介入,每一历史时期的形成,每一历史时期文化的形成都有外来文化如影相随。外来文化对俄罗斯的影响有的带有强制性,有时候是强制性的被迫接受,如鞑靼蒙古人的统治,有的是国家上层的强行引入,如“罗斯受洗”、彼得大帝的改革。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某些重要特质就是在一次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形成或者强化的。与外来文化交流、交融可以扩展本民族文化视野和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可以启迪自我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开放的地理位置和落后的文化状态使得古罗斯人总是被动或者主动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俄罗斯来说,外来文化催生了其文化的繁荣和灿烂,但同时也滋养了民族性格的两面性和走极端的特性。外来文化频繁介入,俄罗斯本土文化、旧的外来文化、新的外来文化并存,并经常发生碰撞。并存时,民族性格呈现的是两面性;矛盾不可调和时,人们往往采取强制性的方法进行文化变迁,民族性格又呈现为走极端。

外来文化对俄罗斯民族性格产生的影响有两个表现,其一是通过影响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而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一些特征的归因;其二是其文化的形成方式,即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来实现一次次突变式的文化进化而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两面性和走极端的一个重要成因。

〔本文系黑龙江大学2010年度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独联体技术创新研究团队成果》(计划编号:hdt2010-26)。〕

(责任编辑 向祖文)

conomic crisis, and that Russian economic recession is the gravest in all G 20. It reveals the main contents and goals of Russian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makes a deep analysis of the Russian government's policy measures to fulfill them. It makes an objective estimation of the 2020 perspective, and points out the important issues worthy of consider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modernization. It considers that the 2020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posed by V. Putin is consistent and in line with Medevyev'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Liu Hongzhong & Zhang Zhenjia Since their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economies have suffered tremendously from the US Dollar issue and received severe blows in their de-US dollarization efforts. The article first weighs the extent of their US dollarization from money and asset substitutions and then their causes and impact and finally makes a deep analysis of the de-US dollarization strategy and specific policy measures.

Jin Huixi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Russians took shape as a result of many factors. A part from geographical and natural ones, the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various crucial period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ir nation and state have a great impact, too. The article traces mainly into the Rurik dynasty, Scandinavian culture, Baptism of Ross, Byzantine culture, the Tartar Mongolian domination, Emperor Peter the Great's reform,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ulture, as well as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Russia, and the vic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gives them an analysis a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at form the Russian national character.

Wang Guixiang The Incident of Beria was a major political one that struck the Soviet political arena after the death of Stalin. On June 26, June, 1953, he was suddenly and secretly arrested as vice chairman of ministers of the USSR and concurrently minister internal affairs. He was soon accused of anti-Party and anti-state crimes and executed by the Soviet authorities. The orthodox accusation has persisted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Few knew the incident in its true feature. As a matter of fact, it was a framed up charge invented out of the thin air. It was an aftermath in the power struggle of the top Soviet hierarchy following the death of Stalin.